汲取改革开放精神 鼓励改革开放探索 激发改革开放动力

——对话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新时代新征程，如何以更大魄力、更务实举措促进改革开放重大突破？在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记者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进行了深度对话。

记者：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您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最难的又是什么？

迟福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45年的历史证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构建起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世界罕见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我从自己40多年亲历改革、参与改革的经历中深切地感受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历史性变化；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我深深体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富民强国的路。

记者：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您认为应如何汲取改革开放精神，鼓励改革探索？

迟福林：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汲取改革开放精神，激发改革动力，保护改革者，鼓励探索者，十分重要。

要坚定改革信念，增强改革自觉。面对改革的新形势与新挑战，深化改革要主动回答时代之问。社会群体对改革的基本诉求已不再是“吃饱饭”的问题，而是自身的全面发展。深化改革要主动回答利益关系之问。今天，深化改革深刻触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硬骨头”，硬在“利益”调整上。深化改革要主动回答行动之问。改革是闯出来、拼出来、干出来的。今天，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需要更多的“改革实干家”。

要以更大魄力、更务实的行动促进重大改革的突破。增强改革预期，重在务实行动，重在严格落实党中央已经部署的各项改革。为此建议：形成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督机制，强化重大改革落实的刚性约束。把改革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以奖惩分明、奖优罚劣激励干部的担当作为。

要调动人民作为改革主体的积极性。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把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相融合，鼓励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改革。一是建立完善重大改革听证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开门问计，为改革建言献策；二是建立健全改革第三方评估机制，客观评估改革成效；三是完善改革容错机制，允许、鼓励、支持基层在改革创新上大胆试、大胆创；四是推行综合授权改革，在明确界定“底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一揽子改革自主权。调动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就是要增强人民对深化改革的获得感，这就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作为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的“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大举措。同时，以提高公共消费比重为重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记者：您认为深化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迟福林：改革自信仍是深化改革的关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自信有了，其他自信将会更自觉、更坚定。

记者：在您看来，新阶段我国高水平开放的突出特点有哪些？

迟福林：总的来说，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高水平开放有着极其鲜明的特征：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基本要求；以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为重要目标；以服务贸易发展为重大任务；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为重要突破；以制度型开放为突出特点；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保障，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开放中深入把握。

记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

迟福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判断。当前，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趋势，要坚定实施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高水平开放，以赢得我国改革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主动。从这一点来说，开放是最大发展、最大改革、最大安全。

要实现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扩大市场开放仍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要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支持社会资本、外资更加便利地进入仍具有相当大投资空间的服务业领域，实质性破除各类“玻璃门”“弹簧门”。有专家建议，立足中欧服务业合作的巨大空间，主动单向实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中方承诺。我认为，这是一个有重要价值的建议。

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深层次制度性变革。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直接融合、边境内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直接融合，是新阶段我国高水平开放的突出特点。我国积极主动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将高标准的国际规则体系延展到国内，在规则对标对接中形成深化改革的倒逼压力与动力；全面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确保内资与外资、民企与国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以主动开放推动自由贸易的重要突破。推动单边开放，是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主动选择、战略选择。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向国际社会宣布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这是中国主动开放的重大举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许。为此，建议分国别、分产业制定实施向东盟单边开放的政策，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重大突破。

记者：青年既是中国的未来，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如何引导青年人看改革开放历史的大方向、看未来的影响，从而将推进改革内化为自觉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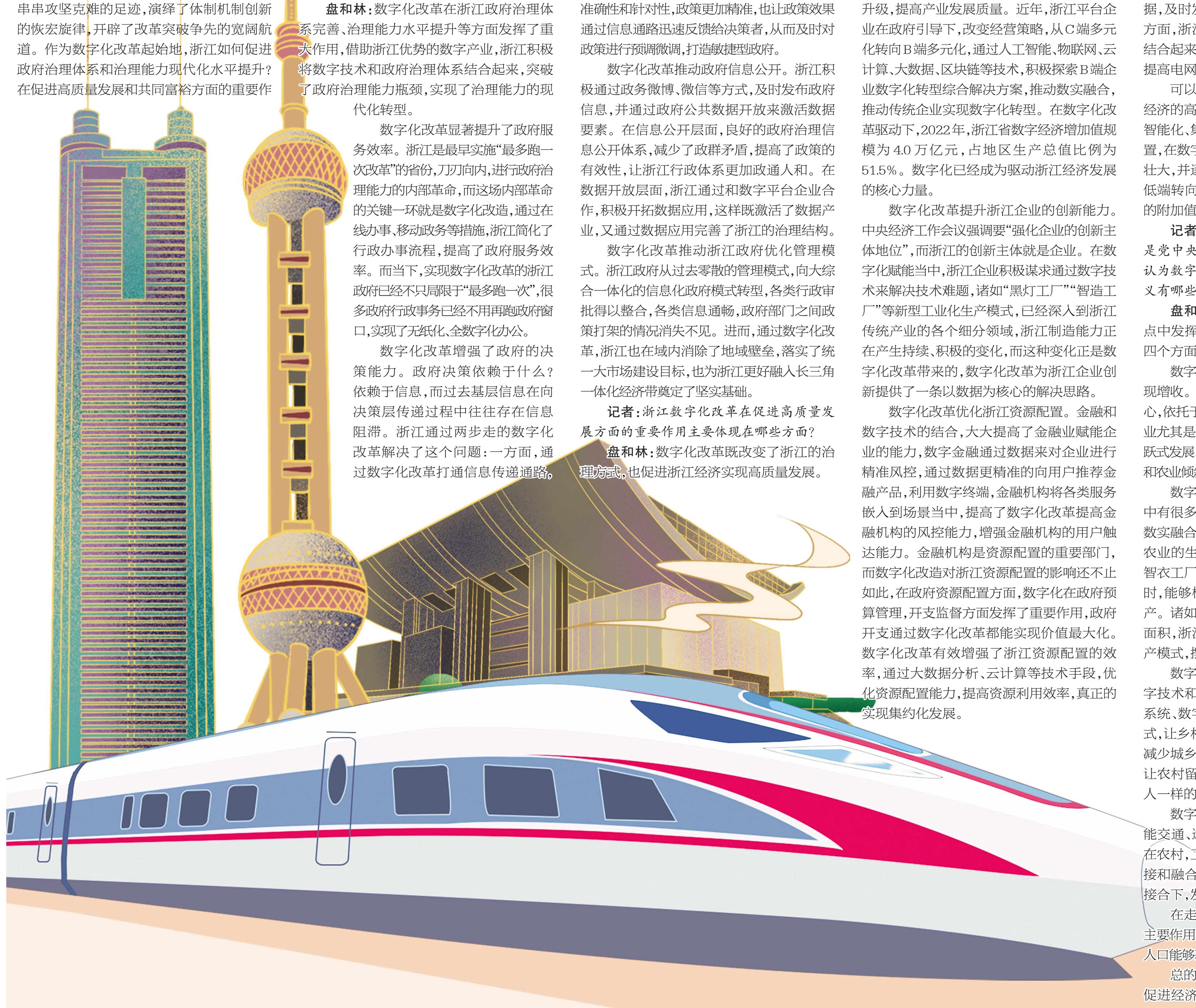
迟福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中央近几年提出加强改革开放史教育，十分重要。过去几年来，在与青年人的交流中，我越来越迫切地感受到客观学习、了解改革开放史的重要性、紧迫性。

客观介绍改革开放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认为，要将改革开放史学习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历史的教学中，把改革开放史和现实相结合；引导青年人看改革开放历史的大方向、看未来的影响。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

浙江数字化改革开拓引领变革先行路径

——专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在全国率先开启数字化改革探索实践。自此，一项项开拓创新的举措、一串串攻坚克难的足迹，演绎了体制机制创新的恢宏旋律，开辟了改革突破争先的宽阔航道。作为数字化改革起始地，浙江如何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对此，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

记者：浙江的数字化改革如何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

盘和林：数字化改革在浙江政府治理体系完善、治理能力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借助浙江优势的数字产业，浙江积极将数字技术和政府治理体系结合起来，突破了政府治理能力瓶颈，实现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数字化改革显著提升了政府服务效率。浙江是最早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省份，刀刃向内，进行政府治理能力的内部革命，而这场内部革命的关键一环就是数字化改造，通过在线办事、移动政务等措施，浙江简化了行政办事流程，提高了政府服务效率。而当下，实现数字化改革的浙江政府已经不只局限于“最多跑一次”，很多政府行政事务已经不用再跑政府窗口，实现了无纸化、全数字化办公。

数字化改革增强了政府的决策能力。政府决策依赖于什么？依赖于信息，而过去基层信息在向决策层传递过程中往往存在信息阻滞。浙江通过两步走的数字化改革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改革打通信息传递通路，打通基层纵向和部门横向两大信息传递通路，使得政策决策信息更加充分；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找到关键信息，从而让政策决策更加贴近问题本质。数字化改革显著增强了浙江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政策更加精准，也让政策效果通过信息通路迅速反馈给决策者，从而及时对政策进行预调微调，打造敏捷型政府。

数字化改革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浙江积极通过政务微博、微信等方式，及时发布政府信息，并通过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来激活数据要素。在信息公开层面，良好的政府治理信息公开体系，减少了政群矛盾，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让浙江行政体系更加政通人和。在数据开放层面，浙江通过和数字平台企业合作，积极开拓数据应用，这样既激活了数据产业，又通过数据应用完善了浙江的治理结构。

数字化改革推动浙江政府优化管理模式。浙江政府从过去零散的管理模式，向大综合一体化的信息化政府模式转型，各类行政审批得以整合，各类信息通畅，政府部门之间政策打架的情况消失不见。进而，通过数字化改革，浙江也在域内消除了地域壁垒，落实了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也为浙江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带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浙江数字化改革在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盘和林：数字化改革既改变了浙江的治理方式，也促进浙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改革推动了浙江产业升级。浙江有很好的数字经济基础，以阿里、蚂蚁等为代表的浙江数字企业既有规模优势，也有技术人才优势，而浙江则积极引导数字平台企业以自身人才和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促其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发展质量。近年，浙江平台企业在政府引导下，改变经营策略，从C端多元化转向B端多元化，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积极探索B端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解决方案，推动数实融合，推动传统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化改革驱动下，2022年，浙江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4.0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为51.5%。数字化已经成为驱动浙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数字化改革提升浙江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而浙江的创新主体就是企业。在数字化赋能当中，浙江企业积极谋求通过数字技术来解决技术难题，诸如“黑灯工厂”“智造工厂”等新型工业化生产模式，已经深入到浙江传统产业的各个细分领域，浙江制造能力正在产生持续、积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数字化改革带来的，数字化改革为浙江企业创新提供了一条以数据为核心的解决思路。

数字化改革优化浙江资源配置。金融和数字技术的结合，大大提高了金融业赋能企业的能力，数字金融通过数据来对企业进行精准风控，通过数据更精准的向用户推荐金融产品，利用数字终端，金融机构将各类服务嵌入到场景当中，提高了数字化改革提高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增强金融机构的用户触达能力。金融机构是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而数字化改造对浙江资源配置的影响还不止如此，在政府资源配置方面，数字化在政府预算管理，开支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开支通过数字化改革都能实现价值最大化。数字化改革有效增强了浙江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真正的实现集约化发展。

数字化改革促进浙江实现绿色发展。数字技术和环保、电网等深度融合，壮大绿色经济的同时，也有效保护了环境，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诸如在环保监测方面，浙江积极通过建设生态环保数据网络来监控环境数据，及时发现潜在的环境风险。诸如在产业方面，浙江积极将新能源发展和数字化改革结合起来，完善电网等基础电力设施的布局，提高电网、环保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可以说，浙江的数字化改革促进了浙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浙江企业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数字化还优化了资源配置，在数字化改革助力下，浙江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从规模化转向高质化，从产业链低端转向产业链顶端，有效提升了浙江制造的附加值，也提高了浙江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记者：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浙江的重大使命。您认为数字化改革在共同富裕试点中的实际意义有哪些？

盘和林：数字化改革在浙江共同富裕试点中发挥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中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数字化改革拓宽了浙江企业销售渠道，实现增收。电商平台本身是浙江产业经济的核心，依托于电商平台、共享经济平台等，浙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拓宽了销售渠道，实现了跳跃式发展。浙江的电商平台积极向中小微企业和农业倾斜，帮助中小微企业和农民增收。

数字化改革提高了生产效率。浙江产业中有很多传统产业，比如轻纺业和农业，通过数实融合、平台赋能的方式，浙江的轻纺业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获得显著提高，诸如智农工厂，从设计到量产仅仅需要不到48小时，能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小批量定制化生产。诸如智慧农业、智慧农机等，受限于耕地面积，浙江农民积极通过精准化改善农业生产模式，摆脱小农经济，实现增产增收。

数字化改革缩小城乡二元差距。通过数字技术和乡村建设结合，比如数字污水处理系统、数字云平台、数字电商、智慧物流等方式，让乡村农民的生活逐渐向城市居民靠拢，减少城乡二元生活差异，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让农村留住人，让浙江人在农村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化生活。

数字化改革驱动浙江城乡融合。诸如智能交通、远程教育、远程办公等，让浙江人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增强浙江城乡之间的衔接和融合。通过数字化改革，未来浙江城乡接合下，发展将围绕中心城市形成城市群。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数字化改革的主要作用在于抬高了基数，让远离城市中心的人口能够获得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便利。

总的来说，数字化改革是浙江完善治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浙江的数字化改革未来还将进一步深化。

>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
> ——习近平

改革开放：既是起跑，又是冲刺！

□ 龚建华

又到年底总结时，身为全世界最大移民城市的深圳一员的我，年底时总有个困扰，信江畔的亲朋好友总会要求我回老家时带点深圳的土特产，可这么多年我好似都未曾寻找到答案，全国各地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地方土特产，可深圳的土特产却众里寻她千百度也无法确认。直至有次课堂上与学员讨论时，大家哄堂大笑过后却渐渐统一意见且默然坚持——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作为深圳的魂与根，改革开放是深圳起跑时的助推器。“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英国《经济学人》如是评价。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为这个奇迹寻找到众多成功因素，譬如：毗邻香港带来的资金人才优势、沿海侨乡地区的海运和贸易优势、中央给予的政策优势……这些因素，都是“深圳奇迹”的必要条件，但却并非充分条件，补上缺憾的就是这个魂与根：1982年，率先放开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逐渐取消粮票和粮本等各类票证；推出工资改革试点，率先实行结构性工资制；1985年，《深圳经济特区户口管理暂行规定》出台，在中国内地率先实行暂住证制度；1987年，《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出台，在中国内地率先开放土地市场……改革开放中，深圳加快了步伐，“杀出一条血路”：第一个打破“统包统配”的“铁饭碗”就业制度、落下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发行国内第一支股票、摸索市场分配外汇新途径……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在改革开放的赛道上，深圳率先起跑，瞬间出发，爆发力十足地展现出这座城市为大国蹚路、为民族探索的决心与实力。

20世纪90年代之后，深圳在改革开放方面继续加速，10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制定出台、实践探索，500多项“全国首次”落地开花。难能可贵的是，深圳从未躺平于既有的成绩，甚至从未满足于过往成功经验，实实在在地把改革开放印楔进城市灵魂。几乎是每隔10年一次的“深圳你将被抛弃”之问总会成为深圳人探讨的热点，“特区不特”之后如何自处？腾笼换鸟空窗期叠加金融危机风波带来的阵痛等等。按部就班、萧规曹随从来都不是深圳的城市节奏，相形之下，“no zuo no die”似乎更能代表深圳改革开放的加速发力，城市生命不息，改革开放不止，而这，也成了深圳奇迹得以实现的“关键一招”。

新时代以来，深圳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基本特色、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发展蓝图。作为发展最快、冲刺最快的全球标杆城市模型，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样板已然成为我们冲线时的锦带了。想要第一个冲过红线，那就必须冲刺有序有力，深圳必须在更高起点、更高标准上推进改革开放。“深水区”“硬骨头”总要解决，而解决的前提就是如何形成城市的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理念，回答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之问？

改革就是要突破一些既有的条条框框，但现在又特别强调要讲规矩，要以政策法规为依据来推进改革，如此一来，创新性的自主探索改革与依法改革之间可能存在对立冲突，当基层的改革探索遭遇到上级部门的否定或者政策法规的瓶颈时，如何保证在既不会有损法治的前提下又能够激发基层的改革动力呢？

改革开放初期，奉行的是改革先行一步的理念。当时谈到改革，人们总会说起“率先”“突破”“敢闯敢试”“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那里，还有“要敢于突破‘法律框框’，‘允许‘良性违法’’”等说法。在制度极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且情有可原，而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今天，正所谓“时势异也”，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并行的新时期，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这个新的时代特点就是法治是基础。有一些人担心强调“于法有据”，就不能“大胆探索”；要求“上下对称”，基层改革就不能“差异化”。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以现行法律没有依据为由迟滞改革。不纠正这种认识，对于改革有害无利。改革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既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又具有明显的形式差异性。

正是基于改革与法治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结合体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作出了“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深刻论断，这是新时代互动推进改革和法治的正确路径。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国当前的改革只能是在法治之下的改革，而不可能是抛开法治另搞一套的改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当前的法治仍然是需要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法治，而不是已经尽善尽美、无需改革和发展的法治。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的改革积极性，使法治如一江春水伴随着改革脚步浩荡前行。

一个以更大智慧和勇气推动改革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藉由特区立法渠道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法治保障。凡属先行性、试验性、创新性的制度建设，要继续充分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发挥经济特区立法权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突破改革发展瓶颈方面的优势，助推深圳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还要积极争取全国人大授权深圳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就重大改革事项进行专项立法。

为改革创新提供容错机制。为了保护地方和基层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必须提供容错机制，为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真正的改革创新者放手闯、大胆干，切实鼓励大胆探索者，宽容改革失误者，鞭策改革滞后者，从而形成激励改革创新的良好环境。

以授权和备案的方式推进改革。对于现有的法律法规滞后或尚无明确规定时，可以向有权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部门授权，请上级给予相关改革项目以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小范围进行试点。这既可根据法定的程序，进行改革探索，避免出现法律的盲区和监管漏洞；又可通过试点总结经验得失，完善改革内容，最终推动相关法律修改。对于基层的改革创新，可采取备案制。对于基层的改革创新措施与现行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冲突的，既可将改革创新方案提请其制定机关批准施行（再依据程序及时予以修改、废止），或是向上级备案，上级适时评估，通过部门集体决策最终转化为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进行积极有效地沟通。积极与上级部门及主要领导进行沟通，取得政策面的支持。建立立法诉求平台。当改革需要法律的支持，而现行法律没有明确依据或是与其有冲突时，可以建立立法诉求平台，吸收与整合相关诉求，同时建立诉求的回应机制，要求立法部门予以及时明确的回复，如有必要，则需尽快立法或修正、废除相关法律。加大法制部门及时清理相关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力度。一些过时的法律法规往往成为当前许多基层改革的障碍。法制部门应加大现行法律法规的清理，为改革创新疏通涉法堵点。**（作者系深圳市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福建：跨越山海，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广

□ 本报记者 丁南

现年77岁的体改老兵刘鸿园，珍藏着一份21年前的通报表彰文件。2002年6月，福建省219位在改革开放战线工作10年以上的同志，被授予“长期从事改革开放工作奖”。时任武夷山市体改委主任的刘鸿园，正是这一殊荣获得者。

一块四四方方的小奖牌，金底红字，落款签名是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委员会主任习近平（时任福建省省长），见证着福建越走越宽广的改革开放之路。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习近平同志曾在这里工作17年半时间。从国企改革的“松绑”放权到民营经济的“晋江经验”，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到“科特派”制度，从生态省建设到“数字福建”……福建坚持用足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经济总量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2022年达5.3万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8位，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

关键词：四下基层
山海腾飞彰显实践伟力

宁德市曾是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总量过去在福建全省垫底。如今，宁德地区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20.1亿元增至2022年的3554.62亿元，经济增速、规上工业增幅已分别连续4年和5年保持全省第一，实现了从“黄金海岸断裂带”到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的华丽蜕变。

改革创新，关键在人。

35年前，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大力倡导并躬身力行领导干部“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

古田县是个典型山区县，耕地面积十分有限。1988年7月，习近平同志开启宁德九县调研行的第一站，就来到古田县。经过深入调研，他肯定了食用菌产业可以作为古田县的主要发展方向。

路子对、效果好，如今的古田县已成长为“中国食用菌之都”。2022年，该县食用菌总产量91万吨（鲜品），产业链总产值235亿元。

35年来，“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历久弥新，不断丰富深化，推动福建经济社会取得新发展。

福州市把学习践行“四下基层”制度作为一线解题、为民服务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集成改革。自去年首个“长者食堂·学堂”落地鼓楼区庆城社区以来，福州全市已建成长者食堂528家，惠及辖区61万老年人。

把“机关会场”搬到“基层现场”，泉州晋江市深入开展“千名干部进千企、一企一策促发展”专项行动，精准帮助企业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今年1月至10月，晋江市实现工业总产值4925.74亿元，增长9.5%。

源起宁德、兴于福建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多年来不断发扬光大，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推动解决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问题，彰显出巨大实践伟力。

关键词：晋江经验
民营经济开启活力之门

福建是民营经济大省。2022年，福建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3.69万亿元，大约是2012年的3倍，民营经济已成为福建经济的特色所在、活力所在、优势所在。

位于闽南沿海的晋江市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5年居全国前四位，综合经济实力连续29年居福建省县域首位。

今年7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晋江经验”被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6年七下晋江调研，于2002年亲自总结提出“晋江经验”，成为福建民营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和宝贵财富。

福建通过深入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深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促进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年8月印发的《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首次以省委全会形式、从战略高度专题部署民营经济工作，着力让民营经济这片“森林”更显“本固枝荣”。

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还相继出台加快民营企业发展25条、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27条、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19条等政策“组合拳”，多层次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转型升级，仅2022年就为企业减负超1500亿元。

福建用好“晋江经验”这把金钥匙，开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门，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华丽转身。现在，民营经济贡献了福建全省7成左右的税收、地区生产总值、科技创新成果以及8成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成以上的经营主体数量。

关键词：生态文明
改革赋能绿色发展道路

多山多水多绿的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

2021年3月的福建考察之行，习近平总书记用4天时间深入绿色南平、如画三明、山水福州，走进八闽青山绿水，强调“要接续努力，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福建耀眼的绿色明珠，南平市率先在全省开展绿色发展机制创新集成改革试点，力争“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新时代10年，福建以约占全国3%的人口、1.3%的土地、2.9%的能耗，创造了全国4.3%的经济总量。

福建发挥林改策源地优势，全面落实“五级党政主要领导抓林改”，一体推进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等综合改革。今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龙岩林改四项举措被吸纳为国家决策。近日，国家林草局印发《林业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第四批），三明市林业金融产品创新与南平市竹产业链建设实践两个案例入选。

在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效打通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转换通道，2022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逾7000亿元，涉林收入已成为林区林农增收致富的重要来源。

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到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从创新打造“森林生态银行”到落深落实森林“四库”，从木兰溪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到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模式”，福建探索的步伐从未停歇。改革，成为“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最亮的底色。

争当深化改革“红墙先锋”

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改革办

北京市西城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深化改革“关键一招”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以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践行“红墙意识”、争当“红墙先锋”，先后获评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全国科普示范区、国家健康促进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连续六届获得“全国文明城区”荣誉称号，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十连冠”，努力实现全面播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

开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新局——

坚持“一把手抓一把手”，强理念、建机制、找方法，以真抓促落实、以实干求实效。

凝聚“想改革”共识，牢固树立“该不该、能不能、怎么办”改革理念。始终把“该不该、能不能、怎么办”作为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的基本原则。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简单地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以改革创新为突破口，推动解决“该办不能办”的堵点、痛点、盲点、难点问题。

创新“谋改革”机制，纵深开展“改革双周会”“微改革微创新”工作。探索建立“改革双周会”工作机制，广邀社会智库、相关委办局、街道、社区、企业人员和专家学者集体参与，形成《改革双周会专刊》《一线话改革》等系列改革调研成果。在全市首创“微改革”行动计划，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在基层改革实践中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成果。

找准“善改革”方法，充分发挥改革试点“前哨站”“侦察岗”作用。近年西城区承担中央、北京市自行设置改革试点30余项，充分发挥试点对全局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比如，深化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开发国内首创的家庭贫困程度综合评估信息系统。

走减量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新路——

围绕破解制约区域发展治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西城区持续加强首都功能建设、加大核心区控规落实力度、厚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系统实施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2—1—1—5—2”框架体系，探索出一条减量发展背景下的首都功能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紧扣“减量发展”树样板，“动批”实现华丽转身。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控增量和疏存量相结合，内部功能重组和向外疏解转移两手抓，“动批”成功转型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的核心区。“产学研用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基本建成，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典型案例并获全国推广。

紧扣“首都功能核心区”补短板，城市更新纵深精细推进。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提升城市建设品质，持续高水平推动控规落地。制定出台城市更新五年行动计划，逐步建立可持续、能循环的市场化城市更新模式。

紧扣“高质量发展”固底板、锻新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金融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数字经济新引擎持续发力。强化“专班机制+政策集成+服务管家”投资促进体系，出台“市场化投促十条”等系列政策工具包。成立北京西城·首都高校发展联盟，首创文物建筑活化利用“揭榜挂帅”新模式，营造以北交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生态。

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新题——

西城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紧紧围绕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围绕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在以更高水平办好民生实事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举一反三，系统治理“急难愁盼”。以钉钉子精神攻坚西长安街街道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率先实施街道大部制改革基础上，持续巩固拓展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成效。启动实施《西城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强主抓手，持续深化“接诉即办”。深入推进“一清单、两行动”，从热线流程优化、基层数据治理、专题场景分析三方面加强接诉即办信息化系统建设，接诉即办综合成绩北京市第一。

精准指导，加力攻坚“学劳弱老”。义务教育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取得关键突破，获批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创新开展“小而精”“小而美”特色学校建设。连续9年创建北京市充分就业区，深化拓展“养老十件事”。

协商共治，共建共享美好家园。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直接向西城区委提出建议制度。探索建立央产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机制，拓展“西城家园”“小院议事厅”等平台功能。

育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新人——

西城区以“红墙先锋工程”强化目标引领，以“双提升”工程打牢基础支撑，统筹解决好“心”与“力”的问题，引导干部树立与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的思想作风和担当精神。

系统实施“红墙先锋工程”，党建引领育新人。以“五力”（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凝聚力、发展推动力、自我革新力）机制贯穿基层党建，构建“1+6”党建制度体系，着力抓好机关、国企、教育、卫生、街道、“两新”6个系统基层党建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纵向同力、横向同心”城市党建工作格局。

深入实施“双提升”工程，自我提升育新人。区级班子靠前指挥，每周带队调研座谈，查找梳理1902个重点提升事项，固化形成了问题发现、反思复盘、提级办理等制度机制。全方位搭建干部成长平台。

回望奋斗路，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西城区发展的根本动力。眺望奋进路，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是对改革开放45周年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最好庆祝。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与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结合起来，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新征程上谱写全面深化改革、争当“红墙先锋”新篇章。